

山西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山西工人的抗日武装——工卫旅的创建和成长

..... 康永和 (1)

工卫旅二十一团的几次重大战斗目击记

..... 薛登岐 (53)

雁北支队发展简史..... 刘 苏 (71)

战斗在管涔山下..... 张初元 (87)

我三进大同做敌军工作..... 张伯骞 (113)

附：舒宏同志墓志

保德屠城记..... 章 彬 (127)

丁果仙的表演艺术..... 张仁健 李守祯 (132)

赵铁山先生小传..... 石润生 (154)

从《正义报》到《祖国呼声》..... 毛大风 (158)

抗日战争时期晋东南南部的报刊工作

..... 徐一贯 (160)

质疑·补充·订正..... (167)

山西工人的抗日武装

——工卫旅的创建和成长

康永和

工卫旅的全称是工人武装自卫旅。它的前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太原工人组织起来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曾经创建了共有十五个正规团的山西新军。新军的主体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共四个纵队），它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的。工卫旅是新军的一部分。但是它和决死队不同，是一支工人武装。它的产生和工人运动有着历史的渊源，当它转移到农村进行游击战争以后，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城市工人运动保持着联系。

工卫旅的创建和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 从一九三六年后半年到七七事变前，是恢复和发展党在太原工人中的组织和组织，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武装抗战的阶段；2. 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是广泛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创建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的阶段；3. 从太原失守到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是工人自卫队转入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为一支正规军——工卫旅的阶段。和其他新军一样，工卫旅是利用阎锡山的名义和装备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起初一个时期，它在形式上是属于阎锡山的部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在党的领导下，在山西境内，新

军和八路军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工卫旅和阎锡山完全脱离关系，正式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抗战初期，我党在华北，特别是在山西，发动工人建立过许多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工人武装中，工卫旅是发展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长期战斗在太原周围，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在西北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过力量。解放以后，它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显过身手。

工卫旅的创建和成长，是山西工人阶级在党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战争指导路线的结果，也是贯彻执行了刘少奇同志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等文件中提出的白区工作正确方针的结果。工卫旅的历史，凝结着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是正确运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三大法宝的一个成功的事例。工卫旅的历史，充满了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民族生存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工人运动和革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回顾工卫旅的历史，对于研究学习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继承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从一九三六年夏天开始，我就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太原工人运动和工厂支部的恢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一九四〇年十月，我参与了创建和发展工卫旅的全部过程，在工卫队和工卫旅中担任过党的领导职务。我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忆这段历史，写出有关材料，提供大家研究。只是现在事隔四十多年，许多情况已经印象模糊或者完全忘记了。我的回忆不可能是全面的，

而且在看法和事实情节上，还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当年在工卫旅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老领导及其他了解这段历史的同志，能写出更多的回忆材料和文章，并对我这个材料中的错漏之处给予纠正和补充。

下面，就是我根据个人的经历，对工卫旅的创建和发展情况的一些回忆。

（一）恢复党在太原工人中的组织和**工作**，

积蓄力量，准备武装抗战

太原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党在太原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摧残。一九三五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阎锡山不顾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败抗日”的主张，悍然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进一步加强了对山西人民的野蛮统治。尤其是一九三六年春，红军渡河东征，冲破了阎锡山的防线，横扫了晋西、晋南广大地区，锋芒直指太原，引起了阎锡山集团的极大恐慌。他们深怕山西人民配合红军起来造反，采取了极端残暴的恐怖手段。在太原，他们规定每个市民都要在胸前佩带一块布质证章，否则不让行动。布证章分三种：第一种是方形的，有铺保，戴这种证章的是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第二种是椭圆形的，有保人，戴这种证章的是他们认为一般的人；第三种是三角形的，无铺保也无保人，戴这种证章的是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当时到太原来的外地人和本地穷人、乞丐等，因为没有这种布证章，被抓去杀害的很多。他们甚至闹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人们往往因为身上带有一块红布、一条红线、一盒红头火柴，或者带有六根火柴、六根筷子，就被说成是共产党的联络暗

号而被抓去杀头。在阎锡山疯狂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仅平时稍带进步色彩的人，即一般群众，为了免于被抓被杀，也只好躲避起来或者逃走他乡。恐怖气氛达到极点。

但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不可阻挡，人民革命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正当山西人民在阎锡山的残酷统治下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山西省内省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东征在山西的土地上撒播了大量的革命火种，党在山西的革命工作也有了新的转机。

首先，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扩展到全国各地，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全国各地，包括山西，都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特别是东征红军在取得许多胜利后，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初主动停止进攻，宣布从山西回师陕北，呼吁“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红军的这一行动，给了阎锡山以联共抗日的实际教育和有力推动。在这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进攻日益逼近山西，蒋介石利用剿共把势力伸进山西抢夺地盘的活动也日益加紧，阎锡山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方面感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了保住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盘，阎锡山在继续培植其反共顽固势力，继续勾结蒋介石，并继续和日本侵略者保持联系的前提下，开始考虑采取某些联共抗日的步骤，以便利用抗日的旗帜和“共产党的人材”，替他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威胁，并借此缓和人民对他的不满。一九三六年秋，阎锡山批准建立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决定任用一批共产党员来替他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党抓住这个时机，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北方局作出决定，派出了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一批干部到山西，接受阎锡山的委任，以便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去公开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我党和阎锡山之间的

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为恢复和发展我党在山西的组织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次，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到天津主持党的北方局的工作，使党在华北各省的组织和工作迅速出现了新的局面。根据当时的形势，北方党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组织各阶层人民，制止内战，实现抗战。但是，当时北方各省的党组织，因长期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和敌人的多次破坏，力量十分薄弱，而且幸存下来的一点组织和力量，还在继续执行错误的方针，没有摆脱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华北的党组织能够担负起它所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少奇同志一到天津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清算白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使白区的党和群众的工作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少奇同志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对于转变当时华北地区的党和群众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端正白区工作方向的同时，少奇同志领导下的北方局还派出干部，以极大的努力去重建和加强华北各地党的组织。对于山西，北方局在派出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一批干部去进行公开工作的同时，还决定以张友清同志为书记，恢复了山西工委（后改称省委），并在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了恢复发展党在太原及其他各地的秘密组织，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山西工委所属各级党的秘密组织和薄一波等同志进行的公开工作，既要在组织上严格分开，又要在政治上和行动上互相配合。在北方局和少奇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党在山西的组织和工作都得到了顺利的开展。

我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于一九三六年夏天，由学校转入工厂，参加了在太原工人中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作的。

一九三三年前，我在太原明原中学读书时，因为积极参加反对校长打骂学生的斗争，引起几位进步同学的注意，他们向我宣传过一些进步思想。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家乡代替别人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员，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较多的认识。这时，我学习了一点马列主义的理论，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加以家庭破产，经济上受到穷困的压力，增加了我对旧社会的愤恨和进行反抗斗争的要求。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一九三六年我进入并州中学读书的前后，很快就和高德喜、郝效烈、施幼章等进步青年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呼声社”，出过一种刊物叫《赤色呼声》，由高德喜领导我们。后来在刘裕民同志领导下改为“太原健风社”，把《赤色呼声》改为《健风》。这两个地下刊物一共出过几期，主要内容是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驳斥蒋介石、阎锡山“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反对他们对日本的妥协投降活动和反共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后期，苏立明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赤色讨蒋抗日救国会”。当时有两位我在家乡发展的“健风社”社员郝士义（后来是我村党支部书记，已退休）、郝五锁（后来是我村的农会主席，已故），向我汇报红军到了我们家乡后的一些情况。他们说，红军、共产党在我们家乡，用打土豪，给穷人分粮，处处关心群众利益的一系列实际行动，一下子揭穿了阎锡山多年胡说的“共党杀人如割草”一类的鬼话，使群众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阎锡山欺压人民的真面目，更加热情地歌颂和拥护共产党。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将他们谈到的一些生动事实，写成传单、小墙报、标语等，如同一九三五年散发《赤色呼声》和《健风》一样，在夜晚工人上下班的路上散发，墙上粘贴，并往文庙图书馆的报章中夹放。有几次，我们利用午睡时间游人不多的时候，把传单贴到海子边伸入海中的凉亭柱上（这样做要事先测量好距离，计算好时间，保证上去下来不会被人看到才行）。我们散发

宣传品，一般都要派另外的同志，以群众的身份，在适当的地方观看效果。我们发现，有的人见到传单，赶紧装到口袋里，准备带回家去细看；有的看了点头称是；有的一看，马上走开，怕出事。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宣传品，都对群众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我在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上述一些革命活动后，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我不愿继续在并州中学读书了，向组织上写了申请，决心到工厂去，进行革命工作。恰好那时兵工厂在招工，我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前去报考了两次，都因为没有“门子”，没有被录取。本来他要的是高小毕业生，我是一个高中肄业生，却考不上。可是，我代替别人考铁路上的打旗挂钩员，却考上了。这说明，在旧社会做事，主要不是凭学问，而是要靠“门子”。

一九三六年六月，组织上通知我到太原毛织厂去做工。我按规定的暗号到教化坊村找到了田恒同志。他一见到我就说：党让我介绍你做工，我只知道你姓康，不知道你的名字。当我去向工头说起时，他说行，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顺口说了个“康永和”。田恒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入党的老党员，当过北京市委书记。他有地下工作经验，能够临时很自然地给我取个大众化的、不惹人注意的名字，用它很适合去做白区工作。

我到工厂的第二天，领导者老张前来和田恒同志接头时通知我说：你是一个学生，能自动脱下长衫到工厂当学徒，做革命工作，说明你有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党组织批准你的申请成为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从此，我在党的领导和培养教育下，由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分子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正式成员，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伟大征途。这是我一生中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我到工厂做工和加入党的组织，正好是党在太原工人中重新

恢复工作的时候。当时担任中共山西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高德喜同志对我说过，他在接受这个职务时，组织上交给他的工厂党员名单只有三人，田恒同志是其中之一。我入党不久，太原毛织厂就成立了党的支部，由田恒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领导我们的同志任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积极进行了争取群众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这时，山西的形势虽然开始有了变化，但是阎锡山对群众运动仍然实行高压政策，特别是他视为很重要的工厂、矿山和铁路交通等产业中心，控制和防范尤为严密。就是在他任用了薄一波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以后，也只许这些同志在上层以他的部属的身份去进行公开活动，不许在下层群众中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党领导我们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机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刻苦地、一点一滴地进行工作，一步一步地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团结到党的周围。

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在生产中和业余时间里，都曾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接触工人，结交朋友。我曾花了两毛钱作为大家摊钱买球用的份金，加入了毛织厂的篮球队，通过打篮球结识了各个车间的许多工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同修理车间工人、全厂出名的曲俊师傅建立了友谊，并进而吸收他加入了党的组织。后来他接替田恒同志担任了毛织厂第二任党支部书记。我们机织车间的张兴业师傅，技术很高，在工厂和工人中很有威信，把他争取过来对开展党的工作非常有利。我想接近他，做他的工作。但是他是师傅，我是徒弟，接近他可不那么简单。有一天进食堂吃饭，他和我同坐在一个长条桌子边。他吃完一碗，想盛饭，但距离饭盆远些。我就抓住机会说：“我靠饭盆近，我来。”我盛好一碗面片汤，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说了声“谢谢”，并一再地看我。从此，再见面时他就同我打招呼。后来我也把他介绍入党，成了党支部的委员。太原市的多次大游行，都是他担

任总指挥。粗梳部的马麟图师傅，文化程度较高，对旧社会不满。我抓住工厂罚他两个工的机会接近他，经常同他上街散步，买东西，边走边谈。我劝他把订阅的刊物由《幽默》改为《力报》。经过一段工作，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我也介绍他加入了党，担任了支部委员。除了争取以上几位师傅外，我还对同房间的薛鸿儒、白俊卿、任友恩等几个工友进行了耐心的工作，也先后吸收他们加入了党的组织。

为着争取群众，积蓄力量，除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外，我们还曾按照刘少奇同志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中规定的策略原则，从胜利的观点出发，领导工人群众进行过许多次斗争。

我们机织部有一个工长，名叫边玉。这家伙力气大，个头一米九，长相很凶，经常骂人、打人、偷东西、强奸女工，许多女工都被他奸污过。工人恨之入骨，但没人敢惹他，因为过去几次反对他的斗争都失败了，连大师傅曲俊和他闹到动刀子的地步，也没斗过他，还几乎被人家开除了。一九三六年冬季，有一天，他在大白天又奸污了一个十四岁的女童工——人家进库取纱，他跟进去就奸污了。一会儿这个女工哭着出来，他在后面跟了出来，人们一看就明白是他又做了坏事，大家议论纷纷。支部抓住这件事，经过研究，认为这家伙有公愤，又在大白天奸污幼女，容易发动群众，取胜把握大，因此决定发动斗争，目标是把他赶走。我们先在本车间串联，当发动到三、四十人的时候，我们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采用了一种颇为特别的做法，让大家签名具结。这种做法就是：在一块白布上，用大小不同的几个碗扣在上面，用铅笔划出大圈套小圈的几个圆圈，在当中最小的圆圈里写上大意是“团结斗争，祸福同当，决不反悔”的誓言；在圈与圈之间的空白处再划出几十个小格子来，大家就在这些小格子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为什么用这个办法呢？一是借此团聚群众，取团结的意

思，一是万一追查起为首的来，叫敌人看不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签名时气氛很严肃，这就是“团结斗争，祸福同当”的具体表示；斗争胜利了，凡签过名的人又都有一种自豪感，互相遇事也显得特别亲密了。当时我们采用这种办法签名具结后，就写“黑状”——状子上只署集体不署个人姓名。状子是我起草的，共抄三份，送给侯家巷公安局、西北实业公司和本厂经理。这状子是党员带头送的，但党员出面的不能多，支书田恒同志就不能出场，以防万一暴露或者斗争失败，不致全部遭到打击。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斗争经验，就是要党员分批参加斗争，不要一齐上阵。我们在送了集体署名的状子以后，又发起捐钱慰问那个被奸污的女工，支持她去告状、催案（这状子也是我替她写的）。我们每人拿出一角、二角，共捐了五、六元白洋。这个数不算少，那时能买到一百多斤白面。我们采取的这些行动都起了作用。过了一个时候，状子先由西北实业公司批了下来。经理把边玉和那个女工，还有她一个嫂嫂（也是我们发动的）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处理。工人们集合了成百人在窗外喊口号助威，要求公道处理，非开除恶霸工头不可。那个女工见有这么多人支持，也顶得很硬。经理怕把事情闹大了，最后不得不决定把边玉开除。这次斗争的胜利，一下子轰动了全厂，大大鼓舞了工人团结斗争的情绪。有人说：“康永和、白俊卿这几个人真有两下子，这次可为咱们大大出了气了！”我们利用这次胜利，引导大家总结经验，使大家认识到过去几次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少力小，缺乏斗争策略；曲师傅闹到动刀子的地步也没斗过他，也是因为个人单干没有把大伙儿团结起来；这次的胜利，是大家团结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坚持斗争的结果。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

在这次斗争以后，我们还领导工人进行过多次较小的经济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领导工人斗争时，我们注意贯彻了“适可而止”的原则，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斗争的坚持时，说服群众及时结束斗争，避免遭受打击。有一次毛永镒工友一个人闹罢工，他把电闸拉了，使全厂停工。西北实业公司马上派来厂警队包围了工厂。事前党支部不知道，群众中也没有串联，大家都毫无准备。工厂被围后，我和田恒同志赶快把党的秘密文件烧毁，然后跑到现场。我们眼看斗争坚持下去一定会失败，就立即设法推动一些师傅出面调解，才使事态平息下来，使工人没有受到损失。又一次，在上夜班的时候，机织布车间的工人把技师李麻子包围起来，质问他：“工人在茶炉上烤馒头，你为什么要罚工？”并且提出：我们不但要在茶炉上继续烤馒头，还要求厂方给我们开灶热干粮（夜班工人自带干粮，冷吃闹病）。这个要求合理，应该斗争，但事先没准备。当时，双方对立很尖锐，有些工人就要动手打这个技师。我一看打人就要失理，还会遭到开除，就从后边拉几个积极分子的衣服，示意他们不要斗了。他们一看是我，一个一个地都散开了。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再去同厂方交涉，厂方同意以后不能因为热干粮而罚工人。

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春，牺盟会的工作深入到工厂。牺盟会太原负责人牛荫冠、张国声、刘仰峤等同志，都亲自到工厂作抗日演讲，号召工人参加牺盟会和抗日救亡运动。党的太原市委通知毛织厂等工厂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要求积极配合牺盟会的活动，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和合法形式，进一步开展党在全市工厂中的工人群众工作。这时，我和田恒同志已经担任党的太原市工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田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我们根据市委指示，发动工厂中的党员带头参加牺盟会，并采取创办工人夜校、出壁报、组织工人歌咏队、讲演会、读报讨论会等形式，在工人中发展牺盟会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绥东抗战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情

绪。我们在太原发动工人积极参加了由牺盟会组织的庆祝和慰劳前线部队的活动。一九三七年春，我被调任中国共产党太原市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工作重点仍是领导太原工运。太原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和工厂党支部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形式，配合牺盟会中的党员，迅速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全市许多工厂。

在工人中发展牺盟会组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阎锡山集团中的顽固派，如兵工厂总办张书田和西北实业公司襄理彭士弘等人，都曾拼命反对牺盟会到工厂活动，反对工人参加牺盟会组织和抗日活动。为了冲破这些阻力，我们曾发动群众，同那些顽固势力进行过坚决斗争。有一天，彭士弘跑到毛织厂来，对工人大讲什么“工人要抗日救国，只能好好劳动，不能参加抗日组织”的谬论。当时我们考虑：毛织厂的工人群众已经起来了，让群众打一打彭士弘等人的气焰很有必要。于是，在彭士弘大叫大嚷的时候，我们发动群众把他围起来，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你不让工人抗日，不让工人牺牲救国，你是不是中国人？”彭被问得难以对答。接着工人们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弄得彭士弘十分被动，想溜溜不了，想躲躲不开，处境非常狼狈，不得不跟着工人也喊抗日口号。我们本着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见他已经气馁了，就闪开一条路让他走了。从此以后，工厂的厂长、工长再也不敢限制工人的抗日活动了。

为了动员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必须领导他们同那些借口抗日、加重对工人剥削的资本家进行适当的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晋华卷烟厂的工人，因反对降低计件工资单价举行罢工，提出“吃饱饭好抗日”的口号。西北实业公司的老板们不仅不理工人的要求，反而扣押了王长秀等两位女工。这事激怒了全市工人。我们组织晋华卷烟厂和一些兄弟厂的工人数千上街

游行，支援他们的斗争。游行队伍走到西北实业公司，浩浩荡荡的群众一下子把它包围得水泄不通，并大喊抗日救国的口号，要他们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女工。彭士弘吓得紧关大门，不敢面见工人，让他的代表跑出跑进，答应先释放代表，再慢慢解决工资问题。结果，游行群众迎接着胜利释放的工友回到工厂。但资本家对工资问题和被开除工人的复工问题，却一拖再拖，不给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发起捐助一个铜板，支援被开除工友的群众活动，一面派代表与资本家谈判。这时，牺盟会和阎锡山的黄色工会都出来调解，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调解，结果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工资不减了，被开除的大部分工人也陆续恢复了工作。

一九三七年五一节，在党的领导下，太原有一万多工人在海子边公园举行了庆祝大会。晋华卷烟厂女工任淑仙代表工人讲话，她呼吁团结抗战，言词恳切，情绪激昂，全场为之振奋。参加大会的工人们，此伏彼起地尽情高唱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工人歌》和《五月的鲜花》等抗日和革命的歌曲。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群众情绪之高昂，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所没有的。它检阅了这个时期党在太原工人中的工作，表现了太原工人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觉悟提高和团结起来的力量。

这个时期，党在太原工运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工厂中的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从一九三六年六月开始着手恢复工作起，到同年十一月，由于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和主观力量的薄弱，党在工厂的组织和工作发展很慢，只有毛织厂建立了比较坚强的支部，发展了一些党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后，由于薄一波等同志到太原，正式形成了我党和阎锡山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并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形式，在全省，首先是在太原，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党在太原各工厂的组织才有了较大的发展。那时，我们曾经从毛织厂抽调了十几个党员，分别派到西北炼钢厂、兵工十一厂、十二

厂、十三厂和六厂等单位，去开辟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到七七事变前后，除毛织厂的党支部外，炼钢厂和兵工一厂、六厂、十六厂、十八厂、晋华卷烟厂、晋生纺织厂、以及印刷厂、皮革厂等较大的产业，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发展了许多产业工人出身的新党员。为了提高这些新党员对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等问题的认识，北方局和省委适时地编写了《党员训练大纲》、《党员须知》等党课教材。我们运用这些教材，对太原各工厂的党员普遍进行了教育和训练。办法是：组织一批老党员，如巩子荣、郭森宇、潘继文等同志，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有的采取单线的个别教育方式，有的采取两三人编为一个小组的形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党在工厂开展工作的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年间，党在太原各工厂中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动员和组织太原工人武装抗战准备了条件。

（二）抓住时机，成立山西省总工会，

全力创建工人抗日武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轰击北平附近的芦沟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芦沟桥的炮声进一步震醒了中国人民，激起了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涛。山西地处华北前线，山西人民尤其热血沸腾，到处发出了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党中央就向全国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的长城”，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驱逐日军出中国。

七月十五日，我党向国民党提交了宣布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在形势的逼迫和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宣布全面抗战，并于八月二十二日正式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主要依靠人民战争去争取抗日胜利的路线，并强调：“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洛川会议以后不久，由陕北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分赴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前线迎击敌人。一到前线，就在平型关取得歼灭敌人精锐部队坂垣师团一千余人的重大胜利。接着，八路军挺进敌后，继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打击了敌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和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国民党失望了，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身上。八路军路过太原时，太原工人自动捐钱买葡萄等水果和其他物品，送到车站去慰劳，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了捉汉奸等抗日活动。同时，工人们在八路军的影响下，要求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抗战爆发后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太原工作的领导。当时北方局决定北方各省党的工作方针是：“动员群众并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援助前线抗战，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北方局对大城市的工厂和矿区、铁路工人的工作非常重视。估计到这些城市的工厂和矿山、铁路将被敌人占领，北方局指示在这些产业中的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除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或协助搬迁机器设备外，要“大胆